

三
國
志
選
評

本书责编：袁庭栋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盛寄萍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
(第一批50种)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巴蜀印刷厂

1990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套

ISBN7-80523-357-8/Z·27

定价：(50种) 130.00元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周 林 邓广铭 白寿彝

主 编

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

编 委

(均按姓氏笔划多少排列)

马樟根	平慧善	安平秋	刘烈茂	许嘉璐
李国祥	金开诚	周勋初	宗福邦	段文桂
董治安	倪其心	黄永年	章培恒	曾枣庄

(以上为常务编委)

王达津	吕绍纲	刘仁清	刘乾先	李运益
杨金鼎	曹亦冰	常绍温	裴汝诚	

(以上为编委)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一

西晋史学家陈寿所写的《三国志》是一部记载三国历史的著名史书，后人把它列为“正史”，是“二十四史”中的第四种。

三国时代是继两汉之后的一个分裂割据时代。东汉中期以后，中央政权主要由宦官和外戚集团轮流控制。他们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中最腐朽的势力，残酷地对人民进行剥削压迫，而彼此之间又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其中尤以宦官专权为害最大。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兄弟姻戚，宰州临郡，贪婪横暴，无恶不作，弄得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激起各族人民不断起来反抗。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僚士

人也对宦官外戚的专横不满，起来主持“清议”，批评朝政，遭到压制甚至杀戮。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大起义，震撼全国。虽然黄巾军主力很快被东汉王朝镇压下去了，但黄巾余众在各地坚持了多年的斗争。黄巾起义给了封建统治阶级沉重的打击，使东汉王朝摇摇欲坠。

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同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更加激烈。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官僚军阀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在中央，外戚、大将军何进图谋诛灭宦官，并召并州牧董卓带兵前来相助。结果何进反被宦官杀死，而司隶校尉袁绍又大杀宦官。董卓到京师洛阳后，凭借武力，把持了中央政权，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袁绍、袁术、曹操及其他一些州牧郡守联合起兵反对董卓。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后来被部下吕布所杀。此后，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各据一方，展开混战，互相吞并。在北方，逐渐形成曹操、袁绍两大势力的对抗。曹操奉迎汉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雄据河北，兵多粮足。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在著名的官渡之战中，曹操击溃袁军主力。以后十余年间，又北征乌丸，西定关陇，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在此之前，孙策于初平四

年（公元193年）南渡长江，数年之间，占有江东。到他的弟弟孙权，更巩固了孙氏在东南的统治。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南征荆州，原本力量弱小、在荆州依附刘表的刘备，用诸葛亮的计策，联合孙权，在赤壁一战中大败曹军，曹操退回北方。刘备在荆州取得立足之地以后，又西入益州，兼并刘璋，占有西南地区。这样，群雄角逐发展为鼎立三分。

曹操死后，其子曹丕于公元220年废掉汉献帝，自称皇帝，国号魏，三国时代正式开始。次年，刘备也在成都称帝，承用汉朝国号，史称蜀汉。公元229年，吴王孙权也即帝位，国号吴。至公元263年，魏灭蜀。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三国时代结束，中国大部分地区重归统一。公元280年，孙吴也为晋所灭。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三国时代仅仅是一个短暂的割据时代，但是这一段历史给中国老百姓留下的印象之深，却超过其他朝代。这一时期的许多历史人物，如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周瑜等等，可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自宋元以来，各种文艺作品如小说、戏曲、曲艺之类，涉及三国故事的不计其数，其中尤以元末明初罗贯中的讲史体小说《三国演义》在人民群众中影响最

大。《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许多重大事件主要出自《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在此基础上，它又虚构了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故事情节，比如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气周瑜等等。如果通过《三国演义》来认识三国历史，这种认识只能是真真假假，假多于真。要了解真正的三国历史，必须读《三国志》。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文艺作品中的三国故事当作历史上的真事，把史书《三国志》和小说《三国演义》混为一谈，所以我们有必要先作一点说明，然后再来介绍陈寿与《三国志》。

二

陈寿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市）人，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晋书》和《华阳国志》有传。他从小好学，曾拜著名史学家谯周为师。谯周学问渊博，著有《古史考》、《后汉记》等多种著作。在谯周的指导和影响下，陈寿攻读《尚书》、《春秋》三传，特别用功钻研《史记》、《汉书》，这就为他一生的史学事业奠定了基础。在蜀汉时曾作过东观郎、秘书郎、黄门侍郎等官，由于不愿谄附专权的宦官黄皓，多次被谴责贬黜。入晋之后，又因为他不注意遵守封建

礼教，生病时使侍婢调制药丸，受到乡里贬议，好长时间没能做官。后来由于著名学者张华的惜才辩护，被举为孝廉，任著作郎，出补平阳侯相（相当于县令），再任著作郎，转治书侍御史。后因继母去世而离职。他遵照继母遗嘱将她葬在洛阳，而没有送回家乡与父亲葬在一起，因此又被人谴责。过了几年才被起用为太子中庶子，但还未上任，就于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病死在洛阳，年六十五。陈寿为人正直，不趋从流俗，一生仕途坎坷，做官不超过六品，当时很多人为他感到委屈。

他的著作很多，共有二百余篇（卷），主要是历史著作。他广泛搜集巴蜀汉中地区从汉代以来的人物事迹，于晋初写成《益部耆旧传》十卷，材料丰富，是四川地方史的一部重要著作，受到后代重视，显示了他的史才。在第一次任著作郎和任平阳侯相期间，他又受命收集整理诸葛亮的遗著和有关资料，于晋武帝泰始十年编成《诸葛亮集》（又称《诸葛亮故事》），共二十四篇。他写了一篇进书表，后来他把这篇表附录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之后，在表中他对诸葛亮作了高度评价。

这两部书的编写为他写《三国志·蜀志》打下了基础。

晋武帝咸宁六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陈

寿开始收集三国史料，写成《三国志》。这部书的完成大约在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当时人称赞他“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正在写《魏书》，看了《三国志》，便把自己写的稿子毁了。陈寿死后，尚书郎范頔向晋惠帝上表推荐此书，说它“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惠帝下诏于陈寿在洛阳的家中进行抄录。

此外，陈寿还写过一部《古国志》，共五十篇，《华阳国志》称赞此书“品藻典雅”。可惜陈寿的上述著作，除了《三国志》而外，都已失传。

三

《三国志》共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后人又称为《魏志》、《蜀志》、《吴志》。本书的体裁，上承《史记》、《汉书》、《东观汉记》，采用纪传体，但它只有纪、传，而无表、志。志是典章制度的专史，最不好写，大概陈寿收集的材料不足，所以没有写志。本书是一部断代史，但他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三国各自为书，可分可合，这也是一种创造。在陈寿之前，记述三国史事的史书，有魏郎中鱼豢的《魏略》三十八卷，魏秘书监王沈的

《魏书》四十四卷，吴侍中韦昭的《吴书》五十五卷，都是纪传体。《三国志》的魏、吴部分，主要取材于以上三书。唯独蜀汉，当时既没有设置史官专修国史，也没有私家撰述的蜀史^①，因此陈寿写《蜀书》，完全是他自己收集的材料。

陈寿对材料的处理，态度相当严谨审慎，这是本书的一个很大的优点。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其剪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也。”例如《献帝传》载曹丕代汉时，有群臣所上劝进表十一道，曹丕所下辞让令也是十余道，劝进是谀词，辞让是虚伪，所以陈寿一律不收。关于诸葛亮事迹，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很多，陈寿在写《诸葛亮传》时作了谨慎选择。如《魏略》说在荆州时，诸葛亮先见刘备，刘备以其年少而轻视他，亮说备以荆州客户补兵，刘备才了解诸葛亮。这与《出师表》说“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合，所以陈寿不取此说。又如后世传为美谈的“七擒孟获”、“空城计”故事，大概当时已有这类传说，晋朝人加以记载（见裴松之注引），但“七擒七纵”事属

① 陈寿有个朋友叫王崇，也是蜀人，与陈寿同仕于蜀、晋。他也写过一部《蜀书》，但不知在何时，陈寿可能没有看到。《华阳国志》说：“其书与陈寿颇不同”。

可疑，“空城计”事更与史实不合，因此陈寿一概摒弃。又《吴书·陆凯传》后附录陆凯谏孙皓的一篇表，陈寿特加说明：“予连从荆、扬来者得凯所谏皓二十事，博问吴人，多云不闻凯有此表，……虚实难明，故不著于篇；然爱其指撻皓事，足为后戒，故抄列于凯传左云。”由此更可见陈寿处理史料的慎重。

陈寿记载史事，一般还能据实直书，如对魏、吴赋役繁重、刑政酷虐有不少揭露。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还比较客观公正。《晋书·陈寿传》记载有一种说法，批评陈寿曾向丁仪、丁廙的儿子索米不遂，因此不为丁仪、丁廙立传。又说陈寿的父亲曾任马谡的参军，马谡失街亭后被诸葛亮处以髡刑，因此陈寿对诸葛亮不满，在《诸葛亮传》中贬低诸葛亮，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这两条批评都是没有根据的。丁仪、丁廙不过是曹魏时的一般文士，而且是公认的倾巧小人，《三国志》中不为他们立传完全应该。对诸葛亮，陈寿是极其崇敬的，在《三国志》中他给予诸葛亮的赞誉超过其他任何人，包括曹操。他把诸葛亮与古代的贤相管仲、萧何、召公、子产相比美，而且特别称赞他：“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这正说明他对诸葛亮并没有私

人怨恨。他指出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这恰恰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并非挟嫌贬损。

不过，《三国志》一书，在写曹魏历史时，确有不少曲笔。在三国之中，它以曹魏为正统。按照纪传体的通例，帝王的传称为“本纪”或“纪”，臣下的传称为“传”。《三国志》将曹操与曹丕以下诸帝的传题为《武帝纪》、《文帝纪》等等；而对于蜀、吴二国君主，则称为《先主传》、《后主传》、《吴主传》等等。后世一些学者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认为应以蜀汉为正统。从这种立场来指责《三国志》自不足取，但《三国志》的尊魏毕竟不是客观公正的态度。当然陈寿这样作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晋朝的天下是从曹魏接过来的（实际上是夺过来的），否认魏为正统，也就否认了晋是正统，陈寿不能也不敢这样作。同样的道理，他在写到涉及司马氏的事的时候，也就不能不有所忌讳回护。《廿二史札记》中专有《〈三国志〉多回护》一条，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司马师废齐王曹芳，据《魏略》记载，郭太后事先并不知道。司马师派人逼取皇帝玺绶，太后说：“我欲见大将军（指司马师），口有所说。”可见她是不赞成的。而《三国志·三少帝纪》记此事，反而全载司马师一手炮制的所谓“太后令”，极言齐王无道不孝，证明齐王

当废。又如高贵乡公曹髦痛恨司马昭的专权，发兵讨司马昭。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派成济将他刺死，罪魁祸首是司马昭。而《三少帝纪》对于这件事仅记载：“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不写他是怎么死的。以下又抄录一大篇“皇太后令”，说高贵乡公大逆不道，祸由自取。并载司马昭的奏，表明司马昭不但无罪，反而有功。这就完全颠倒了历史。象这一类曲笔，确是《三国志》很大的缺点，但这也是几乎所有封建史家的通病，特别是改朝换代之后，新朝初期的封建史家写前朝历史时的通病，不能独责于陈寿。

《三国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简洁。叙事精心裁择，要而不繁，文字仔细推敲，质朴简练。但另一方面，由于他刻意追求简洁，也带来两个缺点：一是过分简略，许多当收的重要史料没有收（例如关于曹操屯田的资料），许多当立传的重要人物没有立传（例如大医学家张仲景、机械专家马钧，等等），更不用说它只有纪传而无志，这就大大影响了它的史料价值。二是文章缺少文采，不够生动。清朝学者李慈铭说：“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司马迁）《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范晔）《后汉